

中国共产党历史 集 疑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广州地区高等院校中共党史教研组编印

J231-44
<1>

729004

中国共产党历史集疑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杨世兰 陈 谦 李香兰 整理
曾锡鹏 梁 仁



20309239

广州地区高等院校中共党史教研组编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



说 明

这本书是广东省高教局组织广州地区高等院校中共党史教研组编的教学参考书。它的容内是集中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史的争议问题，共十万字。目的是帮助中共党史教师与党史工作者，了解与掌握当前我国党史界对中共党史的重大理论和重要历史的学术争论动态，以促进教学与科学研究水平的提高。本书所收集的资料来源主要是1978年——1981年内，国内公开和内部发行的书、报、刊物。参加资料收集和整理工作的有扬世兰、陈谦、李香兰、曾锡鹏、梁仁。由于整理、编辑时间较紧，加之经验不足，水平有限，缺点错误在所难免，希望读者们提出宝贵意见，以便进一步补充、修改。

广州地区高等院校中共党史教研组 1981 年 11 月

目 录

1. 马克思学说何时介绍到中国? (1)
2. 中国共产党名称最早见于何处? (2)
3. 谁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 (4)
4. 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召开的日期 (7)
5. 中共“一大”代表人数有多少? (9)
6. 关于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的时间和成员 (13)
7. 广东共产党的组织何时建立的? (15)
8. 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是党还是团的组织? (18)
9. 关于山东共产主义小组初建时人数问题 (24)
10. 中共“一大”前留法学生中有没有
 共产党小组? (27)
11. 关于党的创始人的标准问题 (30)
12. 关于朱德同志早期经历的几件史实的考证 (30)
13. 彭湃同志何时开始从事农民运动? (33)
14. 毛泽东同志是否在北京看到陈望道翻译的
 《共产党宣言》? (36)
15. 马林有没有参加中共“二大”? (37)
16. 为什么陈独秀在党的“一大”当选为
 中央局书记? (39)
17. 究竟是谁代表安源路矿工人谈判并
 签订十三条协议的? (41)
18. “二七”大罢工的领导人是谁? (43)
19. 怎样全面地评价陈独秀的一生? (44)

20. 陈独秀出生于何年的问题…………… (47)
21. 陈独秀从何时称为党的总书记? …………… (48)
22. 陈独秀对农民运动的态度…………… (49)
23. 陈独秀是否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 (53)
24. 关于出席中共“三大”的代表人数问题…………… (55)
25. 党的“三大”是否存在以张国焘为代表
(7) 的左倾错误? …………… (56)
26. 彭湃同志是何时入党的? …………… (57)
27. 广州农讲所是谁最早倡议开办的? …………… (58)
28. 农讲所以何名义开办? …………… (61)
29. 周恩来同志是何时从法国回到广州的? …………… (62)
30. 毛泽东、邓中夏等是不是中共四届中央委员? … (63)
31. 党的民主革命总路线基本思想
(75) 何时初步形成? …………… (64)
32. 关于周恩来同志在第一次东征时
(08) 担任政治部主任问题…………… (67)
33. 在第二次东征中, 周恩来同志是否任
第一军党代表? …………… (71)
34. 中山舰事件发生时, 李之龙不是中山舰舰长…… (73)
35. 关于“北伐宣言”问题…………… (75)
36.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无产阶级
(02) 是否完全掌握了领导权? …………… (76)
37.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的原因…………… (81)
38. 大革命失败后, 党中央临时政治局
(82) 何时组成的? …………… (82)
39. “八一”南昌起义的由来…………… (83)

II

40. 何时决定南昌起义的? (84)
41. 叶剑英、贺龙、叶挺三同志在小划子上开会的时间 (84)
42. 周恩来同志从武汉到达南昌的时间和谁随同前往的? (85)
43. 贺、叶部队何时到达南昌的? (86)
44. “八一”南昌起义打响的时间问题 (87)
45. 关于南昌起义后成立政权机构的名称问题 (87)
46. “八一”南昌起义部队何时撤离南昌? (88)
47. 贺龙同志入党介绍人是谁? (88)
48. 贺龙同志为何没有去苏联学习? (89)
49. 关于规定“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
的领导机构问题 (90)
50. 毛主席颁布《中央政府关于“八一”纪念
运动的决议》的时间 (90)
51. 毛泽东同志何时选定井冈山作根据地的? (91)
52. 如何看待平江起义? (93)
53. 我军游击战术十六字诀是谁提出来的? (95)
54. 林彪是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
的代表吗? (97)
55. 关于古田会议的会址问题 (98)
56. 向忠发被捕后是否叛变了? (99)
57. 关于陈独秀在中东路问题上致党中央的
三封信的问题 (101)
58. 陈独秀是否堕落成了托派? (102)
59. 关于陈独秀是否是叛徒的问题 (104)

60. 如何认识开除党籍后的陈独秀? (104)
61. 如何评价瞿秋白的《多余的话》? (107)
62. 关于毛泽东同志对立三左倾错误的认识
和抵制问题 (110)
63. 白露会议是否决定创建赣南闽西根据地? (111)
64. 遵义会议何时召开、何时结束的? (114)
65. 何叔衡同志是怎样牺牲的? (116)
66. 张闻天同志在遵义会议上的任职问题 (118)
67. 强渡大渡河是十七勇士还是十八勇士? (119)
68. 红军何时飞夺泸定桥? (120)
69. 巴西会议是什么时候召开的? (121)
70. 陈独秀是不是日伪汉奸? (123)
71. 对百团大战的总评价 (124)
72. 百团大战开始准备的时间 (126)
73. 百团大战的起因及其发动的必要性 (126)
74. 百团大战是否违背中央军事战略方针? (129)
75. 关于百团大战的战役目的和后果 (132)
76. 新四军北移的具体行动路线问题 (136)
77. 叶挺同志如何被俘的? (138)
78. 关于周恩来同志在皖南事变发生后亲自上街卖
《新华日报》的问题 (139)
79. 毛泽东想思是何时由谁首先
提出和论述的? (141)
80. “和平民主新阶段”是刘少奇同志个人提
出来的吗? (144)
81. “和平民主新阶段”是马克思主义策略口号 (146)

1. 马克思学说何时介绍到中国？

马克思的名字最早见于中国的报刊，究竟在什么时候？这个问题，史学界在“文化大革命”前就有所探讨。不过那时只查到一九〇二年。当时主要材料是：一九〇二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中，提到过马克思（译文作“麦喀士”）；一九〇六年，朱执信在《民报》第二号上发表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中，介绍过马克思、恩格斯（译文作“马尔克”、“嫣及尔”）的生平和《共产党宣言》的要点，也提到了《资本论》。

近年来，有的同志围绕这个问题，又作了一些比较系统的研究和介绍。从最近发现的材料来看，这个问题又有新的进展。

《近代史研究》一九七九年第二期，发表了夏良才同志的《也谈早期中文刊物中有关《资本论》和马克思译名的记载》，指出在一八九九年四月，广东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月刊上所载由李提摩太节译、蔡尔康撰文题为《大同学》的文章中，即提到马克思。原文是：“今世之争，恐将有更甚于古者，此非凭空揣测之词也。试稽近世学派，有讲求安民新学之家，如德国之马客偲，主于资本者也……”（《万国公报》第一二三卷）。文中，“马客偲”即马克思的最早译名；“主于资本者也”，即指著《资本论》而言。

《北京晚报》一九八〇年六月二十九日第三版，载署名“一读者”写的《也谈马克思的最早中译名》一文，认为：“在一八九九年（光绪二十五年）梁启超发表的《自由书》中有一节叫《中国之社会主义》，即提到马克思的名字，当

时译为“麦喀士”。

梁启超的《自由书》收在《饮冰室合集》专著第二册里。但细读《合集》全书，发现时间不对了。

《饮冰室合集》虽收录有《自由书》，而且《书》的序言中也注有“己亥（即一八九九年）七月一日”的字样，但是《书》中所收文章并非皆是一八九九年所作，许多都在其以后，有文中所举史实为据。例如有的文章中提到了李鸿章的死，而李死是在一九〇一年，可见文章只能写在此以后，而绝不会在此以前的一八九九年。

经查对，《中国之社会主义》一文，见《新民丛报》第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期合刊本，是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出版，换算成西历，应在一九〇四年初。这样，认为这篇文章所说的“麦喀士”是中国报刊上最早的马克思译名，似乎不能成立。

因此，就目前查到的文献来看，马克思名字在中国报刊上最早出现，应是在一八九九年《万国公报》上的那篇名为《大同学》的文章中。

十月革命前，中国的一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虽接触到马克思学说的一鳞半爪，却不能正确地理解它，更没有广泛传播开来。只是在十月革命后，经过李大钊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介绍，马克思学说才比较系统地传到中国；许多经典著作也陆续有了全译本。这时马克思主义才逐步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在中国革命中发挥了伟大的指导作用。

2. 中国共产党名称最早见于何处？

在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以前，在国内和

东京、巴黎实际上早已存在着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那么，中国共产党的名称最早见于何处？

现在，根据查阅到有关历史文献、资料说明，“中国共产党”最早出现于一九二〇年九月十六日蔡和森同志写给毛泽东同志的信中。这封信，是当时旅居法国蒙达尼的蔡和森同志与在国内的毛泽东同志关于“共产党之重要讨论”的通讯。他在信里坚决主张要“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在此之前，他于同年八月十三日的信中就已经提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毛泽东同志在答复蔡和森同志的九月来信说：“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显然，蔡和森同志在当时提出的建党主张，是非常重要的而且难能可贵的。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七日，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陈独秀、李达等人创办的半秘密性的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问世。他们旗帜鲜明地举起了“共产党”的大旗。一九五七年苏共中央把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档案移交给我们党。在这些档案中，有一份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制订的供党员内部学习的《中国共产党宣言》。这是张太雷同志于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十日根据英文稿翻译成的中文稿。这个《宣言》的中文原稿，是谁起草、下落何方，现在虽然无从考查，但这个由英文译成的中文稿却清楚地表明，这时党的早期组织，已经定名为“中国共产党”了。在一九二一年七月下旬，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并

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在这个《纲领》第一条，就十分明确地规定了我们党的正式名称为“中国共产党”。

3. 谁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

这里讲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指的是1915年9月至1919年4月的反对封建主义的新文化运动。这是一次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它第一次把民主和科学的思想传授给中国人民，使中国人民的思想，从封建主义思想的束缚中得到第一次大解放，使中国人民的政治觉悟有了空前的提高，从而为五四爱国运动和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做了必不可少的思想上的准备。

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是谁的问题，过去史学界就有几种不同的看法，但比较流行的看法有三种：

一、认为鲁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1954年华岗写的《五四运动史》一书中说：“和李大钊同志并肩领导民主启蒙运动的伟大导师，是鲁迅先生”。1957年以石峻为主编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讲授提纲》和《中国近代思想史参考资料简编》都写道：鲁迅在“五四运动时期，他以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急进民主主义者参加了文化统一战线，在斗争中表现了高度的彻底性和不妥协性，这样，就使他成了当时新文化运动中最英勇的旗手和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的先驱。”1978年侯外庐主编《中国近代哲学史》一书，更是以对比方式来突出鲁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它写道：“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在‘五四’运动前夕对‘孔家店’进行了猛烈批判。”当时的李大钊要比鲁迅略低一等，

他“在新文化运动初期是著名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但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不能真正彻底地批孔。”至于陈独秀，他根本就无资格和鲁迅相提并论，因为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我们的任务是“揭穿陈独秀‘反孔’的实质，揭穿陈独秀假革命的面貌。”这种看法没有确凿的事实根据，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

二、认为《新青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1958年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一书写道：“前期新文化运动为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这个时期的《新青年》是新文化运动的首创者，是反对封建主义思想的主要阵地，急进民主主义者的战斗旗手”。这种看法把“旗子”当做“旗手”是不科学的。

三、认为陈独秀通过创办和领导《新青年》的工作而领导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是以《新青年》（该刊创刊时原名《青年杂志》，一九一六年2卷1号起改名为《新青年》）的创刊为标志开始的。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时没有得到任何团体的资助，几乎是单枪匹马，资金要由他来筹集，编辑和社员要由他聘请和发展，重要文章要由他写，主编要由他担任。《新青年》杂志社创刊后虽然是一种同人社的性质，但是杂志社的行政和业务重担全部落到陈独秀一人身上，当然杂志的主要功绩也应该归功于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陈独秀通过创办《新青年》发动起来，是在陈独秀号召下兴起的。鲁迅参加《新青年》战斗的第一篇文章是《狂人日记》。《狂人日记》于一九一八年五月发表在《新青年》

4卷5号上。这就是说，鲁迅是在新文化运动的末期参加《新青年》的战斗的，而且在长达三年另七个月的新文化运动中，鲁迅只参加战斗十一个月，即不到运动总时间的三分之一。在整个新文化运动期间，鲁迅没有担任过《新青年》编辑部的工作，没有参与《新青年》的领导工作，他只是《新青年》的重要的撰稿人。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有三个，一是宣传民主与科学；二是反对封建主义的旧礼教旧道德；三是文学革命。陈独秀在政治思想上领导着上述三条战线上的新文化运动。一九一五年九月，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的第一篇文章——《敬告青年》中首先提出民主与科学两个口号。民主与科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两个最基本的政治口号，是新文化运动的两面大旗，竖立这两面大旗的功绩应该归功于陈独秀。不破不立。民主与专制，科学与迷信是根本对立的。不破封建的专制和迷信思想，民主和科学的思想就不能立。所以，五四新文化运动在竖立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的同时，也吹响了反封建的号角。吹响反封建号角的不是别人，还是陈独秀。新文化运动爆发后，宣传民主、科学和反对封建主义的政治思想斗争，很快就反映到文学领域内，引起了文学革命。文学革命是以陈独秀和胡适于一九一七年一、二月间相继发表的两篇文章为标志，正式开始的。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一文中，在总结国内外革命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推倒贵族文学，建设国民文学；推倒古典文学，建设写实文学；推倒山林文学，建设社会文学。这是陈独秀提出文学革命的纲领。

故于由”。日念五半周八十周半奇良英党产共國中县：“一”

4. 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日期

一、“七一”的由来。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一九三五年以前，国内外的报刊，据不完全的资料来看，没有关于纪念党的生日的消息、社论和文章。一九三六年七月份，除了《共产国际》月刊登载的纪念我党成立的文章外，在同年七月二十五日《救国时报》（巴黎出版）发表了社论：《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五周年纪念》。还在同一天，预报了一条消息：“党中央已议决于本年八月七日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五周年纪念，在全国各地筹备举行庆典。”但是，这一年第三季度的《红色中华》报没有得到证实，是什么原因现未查清，可供进一步研究的线索。

一九三六年七月一日，在莫斯科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十五周年大会。同年，共产国际东方局局长米夫著《中国共产党英勇奋斗的十五年》一书。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三八年五月写的《论持久战》一文中说：“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十七周年纪念日。”当时，七月一日是作为象征性纪念日提出来的，并没有说这是党的“一大”召开的日期。正如董必武同志在一九七一年回忆党的“一大”时所说：“我记得纲领提出来了，七月一日这个日子，也是后来定的，真正开会的日子，没有那个说得准的。”后来的一些文章，把党的诞辰纪念日和党的“一大”开会日期混淆起来，七月一日成了“一大”召开的日期。

“七一”作为党的生日纪念，在一九三九年六月三十日。当天，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发表社论明确说：

“‘七一’是中国共产党英勇奋斗的十八周年纪念日。”由于这一年庆祝活动较普遍，该报在七月二十一日还刊登消息：

“各县热烈纪念‘七一’和‘七七’”。一九四〇年纪念“七一”，在抗日根据地和我党领导的地方更为普遍。同年七月五日《新中华报》曾有记载：“‘七一’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九周年纪念，本市各机关、学校、部队、团体皆于是日放假一日，以资纪念。”当时在某些地区和部队的报纸也有反映。刘少奇同志说：“本年七月一日为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十九周年纪念日，《抗敌报》、《前锋报》及《迈进报》均要我写篇文章。”少奇同志写的《作一个好的党员，建设一个好的党》，就是刊登在一九四〇年七月一日中共中央中原局的机关报《抗敌报》上的。一九四〇年，不仅在抗日根据地，就是在国民党统治区，我党办的《群众》杂志也曾发表社论说：“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九周年的纪念日。”

“七一”作为党的生日，见于中央文件是在一九四一年六月。当时，中央发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指示中说：“今年七一中共诞生的二十周年，七七是抗日战争的四周年，各抗日根据地应分别召集会议，采取各种办法，举行纪念，并在各种刊物出特刊或特辑”。这是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关于纪念“七一”的第一个文件指示。七月一日，延安《解放日报》，重庆《新华日报》都发表了社论。《解放日报》以一个整版的篇幅出了“中国共产党二十周年纪念特刊”，发表了朱德、林伯渠、吴玉章同志的纪念文章。六月二十七日、三十日和七月二日还报道了各机关团体的纪念活动，对党的二十周年纪念更为

隆重，广泛。

二、认为七月二十三日是党的“一大”召开的日期。近二、三年经过初步考证，从“一大”代表行踪、从当时可以借助的间接事件和从当时的文字记载等方面加以分析，现在历史学界比较一致地否定了七月一日是党的“一大”的召开日期，肯定七月二十三日是“一大”召开日期，并认为“一大”的开幕时间是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闭幕是七月三十一日，中间休会两天，起草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

三、认为党的“一大”从七月二十三日到八月五日，共开了十四天。现据考证材料说明，七月二十三日是各地代表到齐上海，但没有说七月二十三日就开会。现有共产国际色木耳斯基的材料说，从七月二十三日到八月五日，共开了十四天。但是有的代表回忆说党的“一大”开了五天会议；初步考证是开了八天，所以说法有矛盾，准确时间仍还需要进一步考证。

5. 中共“一大”代表人数有多少？

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代表人数多少？这是我国史学界长期争论尚未最后定论的一个问题。现在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说法。

一、说“一大”代表十二人，即长沙有毛泽东、何叔衡，武汉有董必武、陈潭秋，上海有李达、李汉俊，济南有王尽美、邓恩铭，北京有刘仁静、张国焘，广州有陈公博，日本东京留学生来了周佛海。说“一大”代表十二人，主要是认为包惠僧是新闻记者“列席”或“旁听”的，不是正式

代表，这是代表人数有争论的一个焦点。根据李达一九五七年三月十八日，在《关于包惠僧的代表问题复中国革命博物馆信》中说：“包惠僧并不是由地方党组织推选到上海出席的代表。包惠僧当时是武汉小组的党员，武汉党组织的代表是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也到了上海，也住在大会代表的寓所。七月一日晚上开会的时候，包也随代表们开会去了，代表们也没有去拒绝他，这是事实。因为当时并不知道组织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但代表们并不承认他是代表。事后，包惠僧自称是广州党组织的代表，这不是事实。广州代表只有陈公博一人”。刘仁静在一九五七年三月回忆说：“一大代表是十二人，李达的回忆较正确，包惠僧不是代表，他在开会前后经常出入于诸代表房间，也到过会场，可能是列席或旁听。”同年四月，刘仁静又回忆说：“毛主席提到包惠僧是一大的代表，另外陈潭秋也有这样的回忆。不过，李达说：他不是代表，而是来串门碰上的，就旁听一下而已。”否认包惠僧是一大代表资格除了当事人李达、刘仁静之外，还有在学术讨论争辩中提出几条根据：第一，通知地区支部开会的信是李达发的。当时通知每支部限派代表二人。武汉支部不比上海、北京重要，不能派三人，这就是说，武汉支部不可能在陈、董之外增派包惠僧。第二，广东代表虽只有陈公博一人，但不能派包作广东代表，因包是武汉支部成员，不能作广东代表。当时我们虽无开代表大会的经验，但前来出席会议的国际代表是不会让武汉支部成员代表广东支部出席这样史无前例的事情发生的。第三，在大会上，大家看到包是事实。包是以新闻记者身份与会的。当时组织不严密，因而包可以自由出入会场。第四，李达同志的话较有权